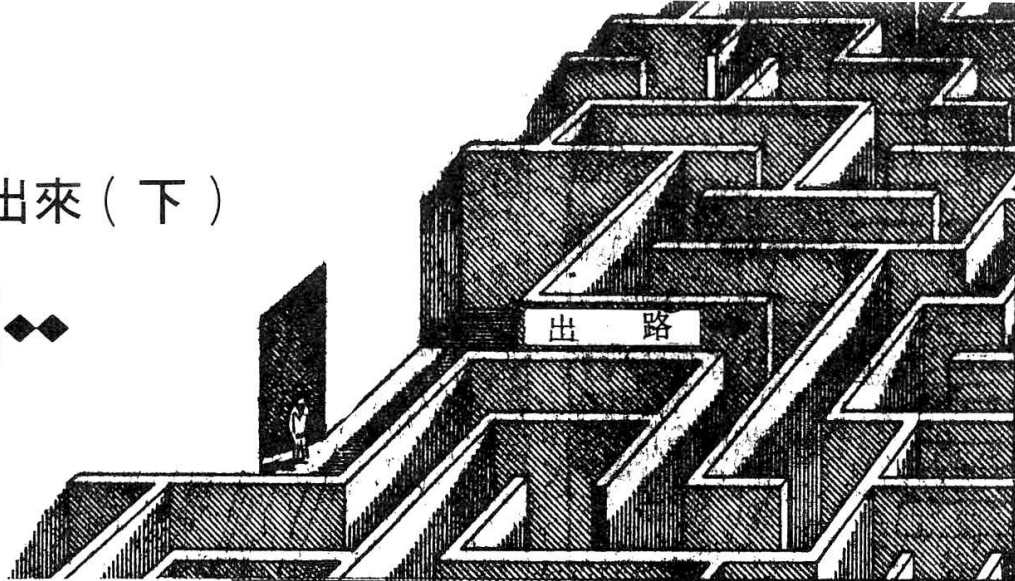


## 從死胡同裡鑽出來（下）

◆ 任致遠著 ◆  
◆ 劉賽眉譯 ◆



### 教宗向中國基督徒講話：(14)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教宗任命了鄧以明為廣州總主教。自此以後，中國與天主教的關係更形惡劣。天主教愛國會大力地評擊梵諦岡對大陸教會的內政作「粗暴的干涉」。其評擊教宗之用詞，充滿怨憤，並對教宗的權力極表懷疑。事發後一個月，愛國會選任且祝聖了五位主教，以重申中國教會的堅決立場。由此觀之，中梵關係豈非又一次鑽入了死胡同裡，毫無出路？

我們對這件不幸的事情深感遺憾，企望中梵關係會在交談與友善的氣氛中重新建立起來。然而，不管情況如何惡劣，它總不能掩蓋另一件極為重要而又完全屬於不同性質的事情，這件事情同樣發生於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八日，當今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馬尼拉向中國教友發言。當天教宗的談話觸及了目前中國教會幾個迫切的問題。現在鄧總主教的風波已逐漸平息，但羅馬主教（教宗）的講話在許多關懷中國無神社會的信徒心中，仍言猶在耳。教宗本人的愛國熱情，他的信德，以及他對馬克斯無神制度的豐富經驗均使到他的講話很有份量。表面上看來，教宗講話的內容並無新穎，但骨子裡却寓意深長。他以溫和及充滿接納的語氣說：「我們對你們的喜樂、希望、和痛苦，所知有限。直至最近，我才接獲從貴國廣大國土的各個角落傳來的消息。但是，你們在這漫長歲月裡的生活狀況，我很難知道。」對於那些誤入歧途的信徒，教宗並沒有責斥他們，反而向他們表示出他了解他們所面臨的困境，教宗說：「這些年來，你們在心中一定產生了這樣的疑問：應該怎樣做？從未經歷過這種生活的人，很難充份了解其中情形。」(23)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瞭解到，在滿途荆棘的困境中作分辨並非易事，某些信徒難免會誤入歧途。若望保祿二世的談話與教宗庇護十二世的強硬態度迥然不同。的確，為許多中國信徒而言，教會前後不同的態度使他們實在感到迷惑，不知道何去何從，應當跟從那一種態度。在此情況下，有些信徒對現實加以分析之後採取了另一種不同的態度。其實，只要保存了信仰的主要因素，採取另一種立場亦無妨。有些人對忠於教會及其起源一點甚為敏感；另外有些人則敏於聆聽聖神的呼召，這聖神會不斷以特殊的方式臨在於天主子民中間。教會就是在這兩極的緊張中逐漸找到了新的出路。當然，人類的一切經驗都有正負兩面的價值。那誤入歧途者的經驗亦非純屬消極，它可能成為我們的良師。(24)「尋找」常常是一個摸索的過程，從不同的方向去尋找使到過程更為複雜與困難，在本文第一部份裡所提到的法國天主教徒就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進步」常是不規則與不和諧的，它往往在曲綫上前行。人類自身的限度和有罪性常是錯誤的原因。然而，偕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我們深信，主耶穌會引領一切願意聽從聖神的人，並為他們打開一條出路。

除此之外，在對中國教友所發表的「一席衷心話」裡，教宗曾嚐試去處理幾個頗為敏感的問題。這些問題在本文的第一部份（見「鼎」第五期）已經提過，現在教宗是在福音及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訓導下去澄清這些問題。教宗的立場似乎有利於「暫時共存」的主張。就是說，當信徒處在「山窮水盡疑無路」的環境中時，唯一的方法就是使到基督徒團體與某政權能夠和平「共存」，以期有一朝會變為「柳暗花明又一村」。

### 教會的本質及其使命：

「教會並無政治野心和經濟企圖；教會也沒有世俗的任務。教會希望在中國，正如在世界其他國家一樣，宣揚天主的神國。」<sup>(25)</sup>

教會是天主子民，她的本質和使命是絕對唯一而獨特的。教會有別於社團、工會、政黨、以及公司。她沒有野心、沒有政治與經濟機巧。教會不僅是人間的社團和有聖統的組織，她同時是「可見的而又是精神的團體」。<sup>(26)</sup>教會在塵世的旅途上分擔着人類的焦慮與期望。她乃孕育於聖父之愛，為聖子所建立，又為聖神所連結、所聚集。按照聖父的旨意，她成為了「世界救恩的標記」。<sup>(27)</sup>

就在這教會內，信徒認識基督、慶祝基督、宣講基督。也就是在這教會內，天主的國——新的世界——已經萌芽。對於現世的政治和經濟，教會不能置之不理，但她必須從信仰的角度來評估這些事實。因為，教會必須先尋求天主的國。<sup>(28)</sup>

教會並非為她自己而生活，她本身不是一個「目的」。她沒有世俗的野心，也沒有征服領土、攫取利益、權力、和聲譽的慾望。她只盼望在世界中為基督作見證。教會經常諦聽人類的各種問題，接受不同思想型態的挑戰。她接納善心人士之啟迪，並以主耶穌的聖言照引他們善的行徑。

中國共產黨面對教會這個有形可見的團體頗為焦慮，深恐教會利用目前宗教自由的政策，形成一股勢力；更恐皈依的信眾日增，教會成為一個龐大的團體，威脅且破壞到政府的權威。教宗的「一席衷心話」意欲解除中共政府的這種憂懼。

的確，教會與政治團體經常糾纏在一起，但二者決不互相敵對。「教會憑其職責和管轄範圍決不能與政府混為一談。」<sup>(29)</sup>教會的使命、真理、和權力完全屬另一回事。<sup>(30)</sup>

「教會不僅鼓勵其成員成為好教友，而且勸勉他們成為模範公民，促進公益，服務同胞，致力於國家的繁榮及進步。」

以上所述種種似乎與「教會無政治目標」之說抵觸。譬如，基督徒投身於「四個現代化」。毫無疑問，此舉實與政治和經濟有關。雖然如此，事實上並無衝突。若在教會訓導的光照下來了解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談話，可分辨出兩種「投身」政治，意義之不同。

何謂「政治」？政治可以指直接參與某政黨的決策，毫無保留地投身於促成某種社會型態；或指致力使到某一撮人獲得政權，或運用手段拉攏人加入某一政治陣容。對於這種意義

下的「政治」活動，教會極力避免介入。這就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所謂的「教會並無政治目的，也沒有經濟企圖。」

可是，「政治」一詞可以從更廣的層面去懂，也就是說，從社會生活的組織方面去了解。若從這樣廣闊的層面來了解，則每一個公民，特別是基督徒，皆有參與政治的責任。基督徒既需要愛近人及愛國家，則不能對人民的公益袖手旁觀。相反，他們必需對社會的繁榮和人類的幸福全力以赴。(31)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又曾堅持：基督徒應當「樂意為大眾利益貢獻所長。優秀的中國天主教徒，定必為國家的進步效勞……。」很清楚，基督徒對社會貴無旁貸。

教宗勉勵天主教徒與中國政府合作。若望保祿二世不再堅持教宗庇護十一與庇護十二的態度。現在，他呼籲信徒積極地去參與國家的發展，摒棄消極的態度，逐漸投入國家的生活中。

畢竟，北京政府有沒有完全領略到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談話的含義？中國的領導人又有沒有瞭解到教宗在態度上的轉變？天主教徒又有沒有機會得悉教宗的講話呢？若有機會，他們又是否能領會到教宗講話時的新態度？如果說教徒與政府雙方都已完全把握了教宗的訊息，未免言之較早。然而我們敢肯定，當這一天來臨時，在中國與天主教會的歷史上將是極具意義的一天。（應當注意的一點是：教宗在馬尼拉的講話未必人人同意）(32)。

### 中國教會的未來：

天主教國際資料中心的鄧守成先生在一次論及中國教會時(33)，曾帶出幾個重點：

誠然，在大陸上皈依的信徒人數甚眾，但他們是怎樣的信徒？如何皈依的？文化大革命使到中國陷於倫理及意識型態的危機中(34)，在這場大災難之後，宗教是否變成了（暫時的）避世場所？難道它不是一條出路，由此可以找到個人靜獨的幸福嗎？難道教會不可能成為填塞意識型態空白的東西，而非重建國家的良伴？(35)

以上的問題，十分重要，但只有生活在中國，對自己基督徒的責任和使命有深刻意識的人才可對這些問題提供深入的分析。然而，在此我們可以肯定兩個事實。

第一：從一開始，個人皈依的理由很少是絕對純正的，往往摻雜了其他外在的因素，因而極需要分辨。慕道期的目的就是幫助慕道者在受洗之前先淨化其動機。在中國教會目前的環境，既缺乏教材，自由又受到限制，負責培育信徒的人又如何能夠引導慕道者呢？

第二：中國教會的領袖與現代神學思潮的發展頗為脫節；譬如：天主教會有關社會的教誨和信徒在現代社會中投身的指示，以及解放神學等等，他們都較難有機會接觸到。由於缺乏這方面的知識，故不易作健全的神學反省。也就是說，對國家目前的實況無法作全面性的了解，亦無法指出教會在這實況中能夠作何貢獻。他們該以何種態度投身於國家的建設？對於這一點，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一席衷心話」皆有指示，二者均非常強調及鼓勵信徒對國家和社會建設的參與。

很明顯，為共產黨而言，最好讓宗教以一種「過時的」和「內向的」型式殘存下去，不

給它有更新的機會，把宗教限制於一種難以理解的崇拜儀式範圍之內，則一方面既不會危害到這信奉無神主義的國家的未來，另一方面亦支撐了馬克斯所主張的「一切宗教最後會自然凋萎」之說。

其實，若仔細分析，共產黨的運籌有許多破綻，首先，上述的情況已很好地證明了宗教並非自由，甚至在教會的禮儀及內政上，教會也無決策的自由。其次，就是信仰在中國的發展的問題。那些未曾得到充份準備而受洗的信徒，對未來教會的命運將有極大的影響。其中最大的危機是他們的信仰生活十分「個人化」，信徒很可能逐漸不再發現基督宗教的「團體」意義。由於信仰生活趨向於獨善其身的個人主義，則信仰便無能成為建設教會和建設國家的一股力量。反之，有理性基礎的基督信仰是會產生負責的信徒的，這些負責的信徒有能力積極地參與國家的發展。事實上，一個負責和有能力的建設國家的信仰比一個晦暗和欠缺理性基礎的宗教信仰更為可取。

倘若北京政府容許中國教會去實現梵二的精神，雖然有些冒險，但却是有利和明智之舉。其實，中國共產黨已經面臨過不少挑戰，本來毋須再畏懼這一次。他們大可以相信天主教徒是愛國和忠心的。如果梵二的精神滲透了中國信徒的團體，則其後果必有利於整個國家和中國教會的發展。

在中國，基督徒雖只是少數民族，但他們的影响力却超出他們人數之總和，因為在過去卅多年來，他們曾面對了不少困難。政府若能與教會真正地和平共存，對整個國家會有象徵性的價值。來自不同背景的人能夠彼此接納將使到先前疑慮的人驚訝。所謂信任產生信任，目前中國政府正設法取得廣大群眾的支持。(36)政府若能與宗教團體和平相處，將有利於政府其他人際關係的發展。基督徒在這一點上也許可以有所貢獻。

譬如：在不受任何壓力之下，教友可以自由地信從其主教之教導，而這些牧者又能毫無拘束地實踐並解釋天主的聖言，在新中國的環境裡引導教會前進。他們可以通傳給信徒一些最近在教會內發展的新思想：例如：

一教會鼓勵信友積極地參與國家的建設。(37)「國民應當記住自己擁有政府必須承認的權利和義務，這權利與義務要他們依照自己的能力，對國家的真正進步，有所貢獻。」(38)他們必須謀求人類的公益，並促進「人類為自己而建立的一切組織內之真、善、及正義的因素。」(39)「他們的貢獻應跨越個人的倫理範疇。」(40)

一基督徒臨在於世界，關注着其同胞之需要，聆聽着他們的期望。中國教會亦應分擔中國人民的喜樂、希望、痛苦、與焦慮(41)。基督徒必須忠誠地愛國，關懷國家的公益。(42)

一教會深信，在現代人身上有許多可以學習的地方，因此，她鼓勵與不同意見的人士交談、與基督徒不同教派交談、(43)與非基督徒宗教交談、(44)特別是與回教、猶太教、(45)非信徒(46)、以及一切善心人士交談。(47)

一「私產權的執行，絕對不能損害公共利益。」(48)現世一切物質的目的皆是為了達到普遍的共享。(49)

一在天主子民當中，本地教會的角色異常重要。它必須吸收福音的訊息，把這訊息翻譯

為現代人所能了解的言語，以傳遞這喜訊於萬民。(50)許多與本地團體有直接關係的決策都掌握在該團體的領袖手上。中國教會負有重要的使命；就是向中國人民作證，中國的地方教會有首要的責任去滿全這使命。

一傳教工作並非如同某些過於熱誠的門徒所相信的，是對福音的「宣傳」。傳教任務的執行必須按每個國家的情況和當地的環境而定。就如教宗保祿六世所言：「首要的宣傳福音的方法是真正基督徒生活的見證。」(52)這種宣傳福音的方法不僅人人可以達到，而且亦尊重了他人的自由。教宗亦同時肯定，克服「饑餓、週期性的疾病、文盲、貧窮、國際關係中的不義……」是解放工程之一，這工程並非是教會宣傳福音以外的事。(53)目前許多有關中國的報導，都描寫了中國社會的紊亂，例如失業、青年罪案、和貪污等。基督徒能夠克服這些邪惡將會大大地裨益於中國的社會。

### 中國宗教政策的問題：

對於宗教，中國共產黨本來毋須費出這個死胡同，因為它控制着整個國家，擁有統治的權力，隨時可以執行一切它所決定的政策和措施。然而，過去幾年來，中國經驗到自己徘徊於強硬派與溫和派的政策之間。這一點說明了中國政府的高級官員面對宗教所顯示出來的緊張和猶豫的態度。中國政府委實處境異常困難。

一方面，共產黨不能否定自己，因此在理論上它跟從最正統的馬克斯思想。在「鼎」第三期，顧汝德(54)很明顯地指出共產黨堅持以往的同樣立場：「宗教呈現出來的，是一幅把生活扭曲，充滿虛幻的圖畫，是毒害人民的鴉片。宗教是錯誤的，而馬克斯主義是科學的真理。」(55)縱然宗教會在社會上延續一段時期，但最後它會自然滅亡。「宗教蜿蜒於歷史迂迴的道路上，逐漸趨於死亡。當社會的環境逐步改進，宗教就會消失。」(56)

另一方面，在實踐上，爲了要形成他們領導的路線，政府必須記取其他很重要的因素。他們的任務並非正如表面上所見到的那麼簡單。

一信徒在中國社會裡有舉足輕重之重要性。當舉國上下皆投身於「四化」之際，最重要是統一全國，不削除任何可以建設國家的動力。(57)

一文化大革命的種種仍歷歷在目；共產黨的領袖極欲從這個時期的活動中游離出來。另一方面，他們亦想孤立和貶斥極端的崇毛份子，從而澄清自己的記錄。

一既然共產黨是官方思想的傳播者，重振黨的聲譽是當務之急。今日在中國大陸，特別是中國青年，對「共產主義的信念已動搖」，對「馬克斯主義的信仰已產生危機」。

(58)根據人民日報的報導，「三分之一的青年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已開始懷疑。」(59)

一在中國，迷信是一個持續性的問題。中國的官方報章不知刊載了多少文章貶譏這一類的行爲。(60)前年，上海大學調查之結果，顯示出大部份學生相信「命運」。所謂「命運」，其含義甚爲模糊，可以包括許多的行動，拜祭祖先亦是其中之一。然而，祭祖算是較受到尊重的一種，尙有其他迷信行徑，其性質極爲可疑，例如看相看掌、占卜算命等等。(61)政府認爲在歷史上一切宗教都是「拖累」，而迷信的行徑爲害更大。因此，目前幾個大宗教所享有的自由，委實是中共政府的讓步，但這讓步具有一個更深

的目標，就是摒除這些宗教內的迷信行動，使宗教的崇拜禮儀變得合理可取。(62)其實，宗教的領袖亦同樣不贊成迷信，很想設法給予信徒較佳的培育以剔除迷信的表現，可是，目前的環境不容許他們去完成此任務。我們實在疑惑，到底政府的這種「補救方法」，也就是說，限制宗教自由的政策，會否有效地治療中國人民的這種愚昧行徑。相反，我們懷疑這種政策不會更鼓勵了迷信。由於群眾的無知，包括信徒在內，迷信有日益擴張之勢。這些迷信的行為既毫無組織，又時起時伏，最後會使政府無法控制。

一爲了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外國的專家和商人會進入中國，在他們當中，有些是信徒。這一事實不應使到政府憂慮。藉着與他們接觸，中國人民亦會接觸到西方的文學、思想、宗教、以及讀物。從此，中國人民對世界大事有更廣的視野。

一在世界的舞台上，宗教扮演了一個極之重要的角色。對於其他國家的信徒，亦不可隨便得失，例如對中東的回教徒。此外，對於港台澳以及海外的華僑，也需要時有接觸，因爲中國需要他們的技能協助國家的發展。(63)

上述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抗衡，解釋了何以這些年來，許多的「原則」仍無改變，而另一方面，信徒的日常生活却改進了不少。目前，對於宗教，一個實用和較爲有彈性的政策逐漸出現。這是使人感到樂觀的理由。這件事情不僅有利於信徒，而且亦裨益於全國，因爲，不同的社團可以慢慢地和諧共存與前進。

### 趨向更真更廣的和諧：

中國的領袖不難了解到，整個中國的真正修和，不僅只限於宗教。這修和必須跨越宗教的層面而延伸到政治上。中國須要容許懷有不同政治立場的中國人共同生活在一個統一的國家之內。台灣問題歷來就是爭執的根由，這個問題影响着千萬中國人的生活，使中國的尊榮失去光彩。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正式建交，北京政府亦主動地提出與台灣政府和談。同年一月卅日，鄧小平在訪問華盛頓時曾指出，北京政府不會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盼望台灣能回歸祖國。鄧小平並說：北京政府會徵得台灣政府及其領袖之同意，採取和平統一之途徑。

雖然，台灣屢屢表示拒絕與北京政府和談，北京對台灣所顯示之友善態度有增無已。北京向台灣最公開的一次招手要算是葉劍英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一日的談話。(64)葉劍英的九點建議特別具有膽色，也因此引起國際人士的注意。台灣不能長期對北京的表態充耳不聞，這種藐視的態度只會增強支持台獨者的立場。事實上，台灣無數的公民都非常愛國，深盼中國能夠統一。最後他們會對政府施以某種壓力。在這些公民當中，也有些是基督徒，他們被迫與自己信仰中的弟兄分離。信徒生活在海峽的兩岸，懷有同一的信仰，但却不能彼此溝通。這些信徒是否可能協助促進國家的統一？兩地的教會又是否可能對海峽兩岸的和解有所貢獻？我們不僅盼望如此，而且亦相信，若北京政府切實執行宗教自由的政策，會增加台灣對北京政府的信任。北京的善意必須付諸具體之行動，只有如此，才可使到更多的中國人相信北京政府的善意是真誠的。

## 結論：

中國政府希冀得到各宗教信徒之信任。他們目前所用之方法雖正確，但仍有待發展及擴大。具體而言，信徒需要在禮儀方面有更大的自由，能夠自由地活出他們的信仰，又能夠在團體中公開地表達，並能自由地與自己的同胞分享自己所信的。(65)這樣做固然是冒險一些，但政府可以相信教徒是忠誠的，他們可能適應新的環境。最近，中國的報章很恰當地指出：「宗教與無神主義之間的爭執並非如此重要」。同時，該報章又說，最重要的事情是「人民的共同利益，不論在政治與經濟上亦然。」(66)在「四個現代化」正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最重要的是指出上述（報章）的分析皆以「人」為中國的共同指標，而人自身的價值愈來愈廣泛地被承認。至於宗教會在歷史的過程中凋萎的問題現在不能立刻解決。只有在將來才會揭曉。此外，對於這個假設的有效與否亦假定政府不以權力去扼殺宗教，導致宗教提早夭折。為了證實這個「假設」的真實，政府對宗教必須採取中立的態度，給予它足夠的空間喘息。如果宗教有足夠的力量，應讓它從事內在的革新，不應加以外在的干涉。如果政府能夠這樣容忍宗教，則中國對宗教的政策更形可靠，甚至對充滿疑惑的局外人也具有說服力。(67)

一切宗教信徒，尤其是基督徒，皆負有重責。我們不可忘記，教會的生活首要是謙誠地忠於日常的工作，在所處的環境中默默地為他人效勞，以堅忍不拔的精神改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些並不顯赫的行為，一旦集腋成裘，就會產生可觀的力量。基督徒不但積極地參與國家的建設，並且亦鼓勵其同胞如此努力。如果政府能贏得信徒的信任，又能使他們覺察到他們的宗教信仰與國家革新之間的關係，信徒便會自動自發地投入國家的生活。有一位來自剛果的司鐸，在剛果革命後數年曾寫下了以下的說話（剛果是正式信奉馬克斯主義的國家）：「共產政府在宣傳中指控信徒只瞻想天堂，對國家毫無貢獻。面對着這些指控，教會非以理論與其爭辯，却以實際的生活來答覆。教會表示出主動地參與了地方的發展，也同時鼓勵人民以非功利的態度投身於國家的進步。我們剛開始瞭解到基督徒基層團體的建立是何其豐富，及其對教會和社會所產生的真正改革作用。」

倘若中國政府給予教會機會，中國教會也會有同樣的反應。這不僅對國家有積極的貢獻，而且亦會增強全民族的革新。如此，基督徒便能夠再一次鑽出死胡同。如果上述的一切能夠如願以償地實現，則將來共產黨會為基督徒致力於國家現代化的熱誠所感到。或許，他們也會寫下如同戴爾都良在致狄奧尼的書信裡所說過的話：「基督徒服從一切國家的法律；他們藉着生活的勞力，不但盡好法律本份，而且還會超出法律本身所要求的。」信徒一方面會誠心誠意地守好法律上的義務，另一方面又會很自然地超過法律所期望於他們的。

目前中國教會所經歷的學習過程，決非只是消極的經驗。雖然一切權力被剝奪了，又受着種種困難的試煉，但她却更栩栩如生地活着，而且很深地經驗到天主對她的愛。在中國的社會裡，教會成為了「萬民之光」，成為了「窮苦與謙虛之僕」。這不是一個「恩寵」嗎？在這三十多年來，她學會了每天單單依靠天主之言的許諾而生活：「你們小小的羊群，不要害怕！因為你們的父喜歡把天國賜給你們。」(69)教會比從前更知道，她不能再依賴自己的力量，而只靠主基督的能力來生活。

附註：

- 14) 教宗向中國教友講話，英文原文見 *Sunday Examiner* 一九八一年二月廿七日。中文譯文見同日「公教報」。「公教報」的譯文比台北「恆毅」第三五七期的可靠。「恆毅」月刊譯道：「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赴亞洲牧靈訪問途中給中華民國親愛的兄弟姊妹講話全文」，故此將教宗講話的重大意義縮窄了許多。
- 23) 在五十年代，波蘭的「和平運動」是由前進的天主教徒所創立。這個運動在波蘭教會內曾引起嚴重之衝突。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熟悉這類問題，因其曾在自己的克拉科夫教區目睹這一切的發生。或許，波蘭的情形可以與中國教會的現況相比。在越南，近期亦有報導，談及主教們在適應新政權上所引起之緊張與衝突。（「世界日報」(Le Monde)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八日）。
- 24) 在一九八〇年九月五日，公教報刊登了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的一封信，其中有一段說：「前人失敗的經驗是我們成功的曙光，只有洞察歷史長河，關心人類發展，付諸行動，才是真正回應現實，改進現實，創造現實。」
- 25) 教宗所說的這話是取自梵二「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第三、第四號。教宗的說話可以視為是對一個「理想」的重新肯定，亦可視為對教會的邀請，呼籲教會對自我作全面性的檢討和批判。耶穌曾在曠野中勇退誘惑，邪惡者以授予統治世界之權力引誘耶穌放棄忠於聖父所托付給祂的默西亞使命。（路四、6~8）教會是有罪的團體，並不如她的創立者一樣，常有勇氣面對誘惑。一如在曠野中流浪的以色列民，她亦屢次背叛天主而崇拜偶像。在教會的歷史裡不乏不忠的事蹟。且舉數例以說明之：在領導層有十字軍和教宗國的建立。在修會方面，有些團體積聚大量財產，固步自封，失去宗教的目的。某些司鐸又給人為鞏固自己而工作的印象。也有不少信徒利用教會來達到自己的目標。若我們捫心自問，上面列舉之過錯，上至梵蒂岡下至最少的基督徒團體，比比皆是。
- 26) 教會憲章，第八號。
- 27) 教會憲章 第一號。根據本憲章之命名，教會的使命是成為「萬民之光」。這個名字蘊含了極豐富的意義，反映着西默盎對耶穌所說的話：「一個無能的嬰孩，既沒有聲望，又沒有權能，但在祂身上已顯示了天主對人類的愛。（路二 32）
- 28) 根據耶穌的命令，很清楚地對宗徒指出：尋求天主的國是絕對首要的事情。（瑪六 33）
- 29) 這個主題在「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有詳盡的發揮，特別是在第七十六號。其中主要的有三點：第一，分開教會與政治團體；第二，教會與政府各自為政；第三，兩者互相合作。亦請參考「民族發展通諭」第十三號。
- 30) 有些觀察家已注意到教宗引述的話與梵蒂岡實際上與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有外交關係一事有衝突。這些觀察家的看法一方面正確，但另一方面不完全，因為政治生活不能只侷限於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再者，梵蒂岡並不是整個教會。梵蒂岡與台灣的關係常被指為是中國與天主教之間修和的障礙。其實，不應過份強調這一點。一方面，差不多所有西方國家均與北京有外交關係，但這些西方國家同時與台北有頻繁的貿易來往；另一方面，許多共產國家沒有類似台灣的問題出現，但國家與教會之間仍有不少問題存在。
- 31) 教會對社會有積極貢獻的例子不少，現且舉三個近期的事例以說明之：  
— *Mgr Tessier* 阿爾及利亞的助理主教宣稱：「在獨立的初期，國家呼籲有志者加入行列。我們會誠懇地分辨，服務國家之意義為何？基督徒可否投身於國家的建設。現在，我們處於一個新的階段，阿爾及利亞人自己執行統治，在政治及經濟上均已獨立。」（「十字架日報」(La Croix) 一九八一年三月三日）  
— 當波蘭主教面臨社會與經濟的困境時，他們呼籲天主教徒去證實他們的愛國熱誠：「祖國仿如我們的共同大家庭。教會訓導我們，愛國是責任，也是美德。耶穌基督已為我們立下了榜樣……。」（「波蘭主教團秘書處」(Biuro Prasowe Sekretariatu Episkopatu Polski)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一至五日）  
— 一九八〇年六月，烏干達十二位主教催促其國民。特別是基督徒，參與國家的建設。（*English Text in "Origins"*）
- 32) 香港某報章批評教宗的講話「不明智」。「在中共佔據大陸之初，天主教是反對共黨的先驅。如今教宗竟願訪問過去天主教所敵視的政權，豈非前後矛盾。」（*星島日報* 一九八一年二月廿四日）
- 33) 鄧守成在 C. A. C. C.（北美天主教關懷中國問題）的會議上，發表了一篇有關「今日中國天主教」的演詞。地點是在美國紐約瑪利諾修會，日期為一九八〇年十月八日。
- 34) 由一封來自上海某學校的女生所寫的信裡可見這信任的危機：「我很想信任我的教授。在新中國建立的初期，他們充滿熱誠，渴望着革命，因而表現精力充沛，活躍非常。他們把他們所秉持的原則拍合在他們的工作和學習上。可是，今日在我們的生活裡已難得看見這樣的活力。理想和傳統的教育都無法燃起我們心中之熱火。我們聽膩了「共產主義」和「革命」的口號，對這些口號無動於衷。我們本應學習人民英雄的榜樣，但事實上我已無法想像這些英雄人物的行為和思想。我感到很難去學習他們，同時，在我的環境裡，我根本找不到他們英雄行為和思想的痕跡……。」（*文匯報*、上海，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日，譯自法文原文）
- 35) 在上述同一封信裡，在結尾的時候指出了意識型態的空白：「我時常檢討這些問題，發現現今的生活和氣氛使我窒息，我不知道如何自處才對。我找不到人生真正的道路。我很猶豫，也很動搖。我走在迂迴的路上，不知應當做些什麼。生活變得如此艱難，生命中的事物永遠在變遷。我會勇敢地面對各種苦難。我亦深知有些思想方式不僅錯誤，而且邪惡。可是，我未能看清楚其真偽，我誠切地盼望有人會協助我。」（*文匯報* 上海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日，譯自法文原文）
- 36) 這篇人民日報的文章在一九八一年六月三日重刊於「中國日報」。它的確想得到廣大農民的心。下面是該文的幾段摘要：「既然黨已日益接近農勞界的心，作為黨的喉舌的人民日報與農民之間的關係已經逐漸更新及改進。自從新的制度首先在安徽省實行以後，有些農民從該報上剪下有關的報導和消息，並把它們收藏起來，作為與那些誤解或拒絕此新政策的人辯論時所用的「武器」。在爭辯的過程中，年青和受過教育的農民尤其聲勢浩大。
- 37) 這個主題，教宗保祿六世在「民族發展」通諭裡會大力發揮。
- 38) 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第六十五號。



- 39) 同上 第四十二號。
- 40) 同上 第三十號；並參考「民族發展通論」第十六、十七號。
- 41) 同上 第一號。
- 42) 教會傳教工作法令 第十五號。
- 43) 大公主義法令 第四號。
- 44) 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 第二號。
- 45) 同上 第三、四號。
- 46) 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第二十一號。
- 47) 見 湯漢、陳尹莹著「基督徒也能在共產中國做個好國民嗎？」神學年刊 第四期。在這篇文章裡，聖公會的丁光訓主教證實了自己對周遭的人的開放，亦告訴了我們，他對中國無神論的反省。很明顯，他曾深刻地經驗到了與無信仰的同胞交談的豐碩效果。
- 48) 「民族發展通論」第三十七號。這個主題曾經由賀道明(Eugene Thalman)神父在一次講道中發揮。這次講道是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三日。除了胡主教以外，尚有百餘神父及三萬五千香港教友聆聽了這次的演講。
- 49) 「民族發展通論」第二十四至四十一號。
- 50) 「在新世界中傳福音」第六十三號。
- 51)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日至十日，在香港舉行了一次座談會，一群與會者曾大力反對「冒險向中國傳教」的新趨勢。若果「重蹈歷史的覆轍，以劃分派系及競爭的精神進入中國，將會帶給中國教會不堪設想的後果。」幸好，懷有這樣傳教觀念的人，為數不多。（「法亞交流資料」Echange France-Asiae, Dossier No. 44 of Jean Charbonnier）
- 52) 「在新世界中傳福音」第四十一號。
- 53) 同上 第三十、三十一號。
- 54) 「鼎」第三期 「毛澤東時代後的中共與無神主義」，中文見第十頁，英文見第四十二頁。
- 55) 光明日報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 56) 「如何加強青年人的無神教育制度」 光明日報 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 57) 「我國為什麼要實行宗教信仰自由？」雷鎮閻著，紅旗 第五期 一九八一年三月五日。
- 58) 明報曾刊登了一篇文章，名為「上海的宗教熱和電視熱」，文中顯示出這危機的深刻。（一九八〇年二月一日）
- 59) 人民日報刊載了一個調查的結果（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指出超過百分之三十的中國青年不信服社會主義是優越的；百分之四十表示懷疑中國能否達到「四個現代化」的目的。在中國大陸，青年佔全人口百分之六十五。
- 60) 最近在中國有關迷信的文章：「一句迷信話，逼死我心上人」四川日報一九八一年三月十日。「抓住時機，破除迷信」大衆日報 一九八一年二月一日。「輕信神漢兒喪生」新華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二日。「談命運」南方日報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六日。「迷信捲土重來，使中共領袖掛慮萬分」，「香港虎報」(Hong Kong Standard)，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二日。溫順天神父曾在「景風」雜誌上對迷信的現象加以詳細的討論。參閱「景風」(英文)第二十三期 第二號 一九八〇年。文章命名為「封建迷信行徑在中國之復甦」(“Resurgence of Feudal Superstitious Practices in China”)
- 61) 在「他們為什麼變成有神論者？」的文章裡，作者杜烽自稱是共產黨員，他目睹在中國迷信流行之現象而表示甚為憤怒。
- 62) 共產黨現在把迷信和宗教清楚區分開來，前者是有害的；而後者則含有積極的因素，例如：古老和豐富的傳統，每個宗教都有其經典，生活的規律……等等。
- 63) 這部份有些思想是取自顧汝德之文章：「當代中國政治中的宗教」，見神學年刊 第三期。
- 64) 大公報 一九八一年十月一日。
- 65) 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在他們的公開信中向中國政府提出他們的觀點，他們的觀點與要求實在合理：(一)容許聖經及各類宗教書籍在國內流通；(二)准許民間組織宗教團體及公開舉行宗教禮儀；(三)加強落實執行保障宗教人士之公民權利；(四)政府不能影響教會之決策及內政；(五)不阻礙國內宗教人士與外界宗教人士接觸。
- 66) 「為黨而言，在宗教事務上，『宗教信仰自由』是最基本的政策」 光明日報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 67) 「毛澤東後的中國天主教會」 梁作祿著，第四十六頁。
- 68) 「社會主義與教會」 「靈修雜誌」(Spiritus)，No. 66，第二十一頁。
- 69) 路加福音 第十二章卅二節。